



晚明鄂东学术据点形成探源

——耿定向与李贽讲学论战的文化史考察

蔡志荣

摘要：晚明耿定向与李贽的讲学、交游、著书、论辩等学术活动吸引了境内外各家学派大师汇聚鄂东。耿、李二人之论道讲学以至公开论战，掀起鄂东学术热潮。其既是鄂东学术思想活跃之代表，亦是鄂东学术据点逐渐形成之标志。这些活动对推动晚明学术发展以及鄂东地域文化形成均具深远影响。

关键词：鄂东；耿定向；李贽；学术据点

明中后期，在王守仁、湛若水之学的影响下，讲学已蔚成风尚，形成了多个区域性学术中心。学术界对明代江西^①、徽州、浙江等地的学术活动关注较多，有诸多论著，而有关楚中讲学尤其鄂东讲学的研究成果甚少。实际上，晚明在人文和经济都不是特别突出的鄂东，在全国讲学大潮中却异军突起，成为许多士人向往、奔赴之地。究其原因，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李贽、耿定向两人在当地从事的学术活动有相当密切的关联。耿定向归乡和李贽归隐黄麻论道讲学，最初二人心心相契到“论道相左”，以致相互攻击、叫骂，演绎一场学术论战，轰动朝野，更吸引了一大批学者、文人、士大夫围观辩论，从而使学术圈外的鄂东学术活动热闹非凡。从文化史视域重新审视二人在鄂东的学术活动，探讨它们对阳明学的发展，与其它地区学术活动的呼应、对话、交流，以及对地域文化发展、社会风俗演变的影响等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晚明鄂东学术活动兴盛

王守仁、湛若水倡对讲学，宣传、完善、发展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思想体系，讲学活动因而在全国掀起。湖北地区讲学之风也日益兴盛，对此，甘鹏云在整理《湖北文征》时概括了湖北境内讲学的盛况：

……有明一代，讲学之风最盛，大都宗主白沙、甘泉、阳明三家。就湖北言之，李承箕、李承芳、吴廷举、朱伯骥、曹璘，源于白沙者也。何迁、余胤绪、袁国臣源于甘泉；则白沙之再传也。蕲州二顾、黄安三耿，源于阳明者也。唐希皋师事钱德洪。张绪师事邹守益，刘承烈师事耿天台。则阳明之再传也。李若愚师事张甄山，则阳明之三传也。贺时泰讲学汉上，黄彦士、黄奇士、萧继忠、彭遵古、彭好古讲学问津。皆阳明之私淑也。方汝时讲学白云洞。而旁求神仙，则阳明之别派也。讲程朱之学者。惟李汰、欧阳东风、东白兄弟。张明道、方一凤、刘应珂、

^①台湾的吕妙芬对阳明学讲学兴盛的地区，江西吉安府、浙中、南直隶宁国府为代表进行详细研究。见吕妙芬《阳明学士人社群》，新星出版社 2006 年。

万全、朱宠、詹时明数家而已。凡讲学家文字。虽义法稍疏，亦必采人。俾学者稍知讲学之流派。其无从搜罗者从阙。（甘鹏云：《湖北文征》例言）

甘鹏云对明代湖北地区讲学的学术源流、派别及代表人物只是简略的介绍，可见湖北境内各地讲学成风，涌现一批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和影响力的学术领袖，学术争鸣非常活跃。当时盛行的几种流派有白沙、甘泉、阳明三家，阳明学派的再传以及程朱理学，在湖北境内都有传播。而与学术繁荣的江西接壤的鄂东蕲黄一带，涌现一批学术大师，如黄安耿定向、耿定理、耿定力三兄弟，蕲州顾问、顾闳兄弟，掀起一股讲学论道热潮。章学诚评论道：

明嘉靖以还，学者多趋余姚王氏，而大湖南北，盖本泰州王艮所传，则已为别派矣。蕲黄之间，江西接壤，新建故治，流风在人。若黄安耿氏、蕲州顾氏，皆豪杰之士，能自振起，虽兄弟家学，不相因袭，则其得失，亦不尽由师说然也。（章学诚：《章学诚遗书》卷25）

湖北境内学术活动大多以书院为阵地。例如嘉鱼李承箕、李承芳兄弟从学于陈献章，致仕后归隐黄公山义学书院讲学；何迁在家乡德安建吉阳书院讲学。相对来说，这些地域讲学比较分散，辐射面也较为狭窄，而鄂东地区讲学活动则比较集中，形成以书院为阵地的学术交流网络圈。黄安耿定向、耿定理、耿定力兄弟在天台、天窝、钓台书院讲学；蕲州顾问、顾闳兄弟在崇正、阳明书院讲学；麻城周思久、周思敬兄弟，致仕后建辅仁书院讲学授徒；黄梅瞿九思曾在白鹿、濂溪、岳麓等著名书院主讲，巡抚御史史学迁欣赏其才华，特建江汉书院为其讲学、著书之所；蕲州陈大中曾任户部主事、员外郎等职，归隐后建凤麓书院授徒讲学等。（民国《湖北通志》卷五十九《学校》）。兄弟联袂、师徒延续、官员倡导讲学，一时人文蔚起。其中创建于宋末元初黄冈问津书院沉寂二百年后复苏、兴盛，成为一个重要学术研讨中心，制定讲学会约，形成规制。每月十五，鄂东鸿学名儒汇聚一起讲学论道，吸引了境外学术领袖邹元标、罗大弘、焦竑、顾宪成、高攀龙、冯从吾等前来讲学论道，其影响可与岳麓、首善、东林等书院相提并论。（光绪《问津院志》卷四《讲学源流》）

鄂东人文、经济相对落后，虽然不能与风景秀丽、物产丰富的江南，人文兴盛的京城、南京相比，然而鄂东掀起讲学热潮具有一股强大吸引力，许多文人、硕儒前来造访，少则几天，多则几年，甚至长期定居。鄂东学术活动兴盛，得益于两个核心人物，一是黄安理学大师耿定向；一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。前者以其官宦名声与思想地位，吸引王阳明士人与其切磋问学；后者不仅因大胆鲜明的思想引聚士人而在地方上掀起风潮，而且凭藉个人的魅力与特质，吸引许多士人、文人与之结交论学。二人与外界学者交游往来，尤其与当时江南、江西的学术大师密切往来，相呼应、对话、交流。例如江右王门的邹守益、罗洪先、邹元标；泰州学派的何心隐、罗汝芳；甘泉学派的冯从吾；东林学派的顾宪成、高攀龙等纷纷前来鄂东开展学术活动。正是因为鄂东良好的学术氛围，没有门户之见，兼容并包，自由讲学，既有王学流传，也有湛学交融，还有东林学派，形成各家学说辩论纷呈，学术繁盛，以鄂东为中心学术据点逐渐形成。

综上，既然鄂东学术据点形成与耿、李的讲学论战关系密切，这里就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厘清。

二、耿定向、李贽在鄂东的学术活动及影响

耿定向，是嘉靖三十五年进士，历任御史、巡按甘肃、督学南京等。为官期间在京城、南京等地讲学，追随者众，是活跃在阳明后学讲学舞台上重要人物，推动明后期讲学运动，形成局部讲学复兴^①。耿氏出了三位科举人才，是地方名门望族，耿定向的名宦硕儒身份，更在地方社会具有很高的话语权。

耿定向一生几乎可以说是传统观念中“士人”的标准范本——站在官僚系统的上层，位居庙堂心忧天下，身处乡里谨守儒家礼教。耿定向所处时代，正是王学末流空疏异化时期，他们空谈“心性”、曲求“良知”，耿定向力图纠正王学自身弊端，进行反思补救，以拯救王学为使命。因此，耿定向注重经世济民，关注社会现实，认为自己的身份就是“近为乡里后生之耳目，远为四方友朋之宗依”（耿定向：《耿天台先生文集》卷六《与同志》），必须担负起教化民众、改善风土民情的社会责任。黄安一地原为荒野偏僻之地，

^① 赖玉芹：《耿定向讲学的影响》，载《光明日报》2009年6月18日。

盗贼蜂拥,民风不醇,社会治安很差。章潢认为黄州府“民刁悍健讼难治”,麻城一地“务耕读,刁烦冲”(章潢:《图书编》卷三十九)。他期望通过讲学推动社会教化,移风易俗。万历十七年辞官归乡热衷推行讲学活动,与其弟耿定理、耿定力,创建天窝书院、钓台书院,召集地方士人读书、讲学,倡导道德伦理,改进士人风尚。黄安的石林书院,有石林樵洞和石林山房,耿定向和其弟经常在此读书、著书、讲学,境内外慕名而来游学者以明状元焦竑为首共18人。(光绪《黄安县志》卷一《古迹》)耿定向深受泰州学派“百姓日用之学”思想影响,其讲学内容面向社会民众,注重通俗易懂,意在让更多的市民阶层了解性理、心性之学。儒家伦理道德用通俗语言讲解,普通百姓能轻易理解受其感化,从而提高地方学风,引导乡里风俗淳化。他甚至亲自断谿兄弟争夺财产案。(《问津院志》卷四《讲学》)

耿定向虽长期在外仕宦,仍一直关注地方社会建设,黄安原属麻城,黄安立县耿定向起到推动作用。回乡后重新倡导乡约,开展“道俗维风”的工作。认为“昔王文成抚赣,实始创行保甲相约,盖即国初里甲令制之意而润饰之,非有异也”。(《耿天台先生文集》卷十九《题黄安乡约》)耿定向在这里将王阳明的事功与明太祖朱元璋创制里甲制相提并论,一方面希望心学家经世致用关注地方社会的建设;另一方面也隐含希望将心学融贯到国家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之内,证明心学亦可成为主政者经世济民的治国方略。耿定向十分关心地方文化教育,黄冈新洲的问津书院年久失修,于是经常带着两个弟弟去书院讲学,并督促弟子书院山长萧继忠扩建、维修书院,制定讲学会约、学规,书院维修、扩建,远近乡里子弟奔赴求学,“邑之俊髦大半出其中焉”(《问津院志》卷四《讲学源流》),成为地方教育中心。

在耿定向倡导和践行下,以讲学为主的学术活动大大促进了风俗教化,乡里一片淳美学风,文教兴盛,人心向道。光绪《黄安县志》对此评价很高:“嘉隆之际,耿恭简倡明理学,里中因之兴起联会讲学。间诵巷歌,以聚文谈道为高,华竞厚营为耻。即穷檐侧陋之士,或羞对持衡;而绿林揭竿之魁,亦回心向道。”耿定向以名宦硕儒身份讲学,在地方具有很大影响力和感召力。鄂东各州县的学者通过交友交游、切磋论学连成一体,形成一个学术文化圈。黄安进士卢尧臣“长从耿定向游”,黄梅瞿九思“年十九谒耿定向问《春秋》”。(章学诚:《湖北通志检存稿》卷二《瞿九思郡敬传》)求学追随者“履恒满户外”。(光绪《黄安县志》卷九《艺文·天台书院记》)耿定向归乡前已是阳明后学讲学名家,归乡后许多境外学者仍慕名到黄安与之求学论道,有的拜访即别,有的侨寓数年。仰慕之士“如鸟投林,如川赴海,无不人人扣两端,期于有瘳”。(焦竑:《澹园集》卷三十三)耿定向的弟子明代状元焦竑来此久住,还有江西知名阳明学大师何心隐、罗汝芳、胡直、邹善、张绪、刘元卿、贺宗孔等到鄂东与之一起论道讲学。耿定向去世后,时朝廷首辅王锡爵为其作墓志铭称赞:“隆、万间,讲席之盛,莫如麻城天台耿公……四十年来,为耿氏之学者盛天下。”(光绪《黄安县志》卷九《艺文》)由此可见,耿定向名气之大、门徒及追随者之多、影响之深远。黄宗羲虽认为“天台之派虽盛,反多破坏良知学脉”。对耿定向的学术来源、宗派虽有微词争论,但不得不承认,“楚学之盛,惟天台一派,自泰州流入”(《明儒学案》卷二十八《楚中王门学案》)耿定向在湖北甚至在全国阳明学派讲学活动中有相当影响,荆楚地区的王学,在耿定向的引领下亦渐成气候。

鄂东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学友,吸引了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。李贽从54岁到75岁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鄂东黄安、麻城一带生活。

李贽40岁后,才开始接触王学,先后结识了耿定理、耿定向、王畿、罗汝芳、何心隐等王学名流,与他们讲学论道,也开始积极倡导讲学。后李贽辞官归隐居住黄麻一带天窝、洞龙、龙潭书院,讲学、交游、著书,以他为中心形成学术辐射网络。他不拘俗套,讲学不限地点和对象,有时在佛堂,如芝佛堂,有时在山中游玩中。讲学不限对象,门户开放,“有教无类”,一起论道探讨的不仅有文人鸿儒,也有挑夫、小贩、僧徒、尼姑等。李贽倡导男女教育平等,男女兼收,例如其才华出众的女弟子梅澹然、梅善因等,李贽不吝言辞给予高度赞扬,鄂东妇女求学之风因此而起。李贽认为“学问须时时拈掇,乃时时受用,纵无人讲,亦须去寻人讲”。(李贽:《楚书》卷二《答庄纯夫书》)李贽认为做学问要时时与人交流、对话,从中受益,激发灵感,激荡思想火花,因此十分热衷交游、论学,尤其是与志趣相投、心灵相通挚友论谈,经常组织讲学、聚会。除了耿氏兄弟,他还在鄂东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、求学问道师友,如麻城大族梅国桢及其子梅之涣、梅澹园;周氏家族周思久、周思敬兄弟,以及地方名士杨定见、丘坦之、汪可受,高僧无念、怀林及各

色人等。同时,在他周围汇聚了一批在晚明很有影响力的学者,如罗汝芳、汤显祖、冯梦龙,以及明代科举状元焦竑,还有管东溟、潘士藻、江进之等。他们切磋学问,并且在经济上、物质上资助李贽,帮助他整理、誊印、刊刻书稿。李贽自认深得王学之妙,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,把由泰州、龙溪而风行天下之阳明先生之学的泰州学派的狂狷肆意发扬光大。他标举“童心”说,对儒家传统经典提出质疑,在论辩与诘问中,进一步构筑起自己的论学宗旨,在思想上逐渐形成个人理路。鄂东生活这段时间正是李贽思想发展的旺盛期,他一生中的主要著述,《焚书》、《藏书》、《续藏书》大半是居住鄂东完成的。

李贽因其大胆激昂言论、不拘俗套行迹,给鄂东学术思想注入了新鲜的活力,他卓尔不群的个性、独立特立的行径、不拘流俗的言论,对鄂东士风、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,极大吸引了湖北士人后学的倾慕追随,沈鈇《李卓吾传》记下了万历十九年李贽到武昌的盛况:“楚省士翕然争拜门墙”,“再往白门(南京),而焦竑以翰林家居,寻访旧盟,南都士跟靡然向之。登坛说法,倾动大江南北。”^①《明史》中虽没有单独给李贽列传,只是在耿定向传中,用简短文字提到李贽,但部分事实反映了李贽在鄂东讲学的深远影响。正是李贽离经背道,挑战主流,不畏权威,震撼传统,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,引起封建卫道者警觉,视其为“异端”、洪水猛兽。张问达写奏弹劾,夸大其词,称李贽在麻城“一境如狂”、“惑乱人心”,李贽终因不容于世而被捕,绝望中引刃自刎。

李贽对鄂东文风影响也颇大。公安三袁慕名多次到鄂东拜访李贽,得到李贽的欣赏和教诲。李贽的“童心说”和三袁的“性灵说”有异曲同工之妙,三袁受李贽感召启迪,进而发展性灵之学,掀起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文学革新。三袁倡导并践行文学真实表达人的情感和欲望,在晚明文坛上刮起一股清新自然的文风。在公安派的影响下,以钟惺、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湖北天门,提出“真诗者,精神所也为”,从而引领晚明文坛新潮。

三、耿定向与李贽的学术论战

耿定向与李贽最初是相交相识、情投意合的知己。李贽认为“独学难成,唯友为益”,一生云游四方寻访志趣相合、心灵相通、共同实践的挚友、学友。李贽最初在南京见耿氏兄弟,一见如故,结下深厚情谊,尤其是耿定力弟弟耿定理。耿定理,字子庸,海内尊称为八先生,一生无意科名,至死只是生员。耿定理虽没有其兄官位高,但学术声望并不亚于其兄。李贽正是服膺定理而称之为师,辞官归隐黄安,希望日夜与定理谈学论道。除几次短暂外出旅游外,在鄂东生活二十多年的时光。李贽最初很满意鄂东归隐生活,以鄂东为人生归宿,朝夕与耿氏兄弟以及鄂东士人讲学论道,认为找到人生知己和归宿,一起探讨、追寻生命的终极关怀。

耿李之间分歧恶化,始于耿定理英年早逝,二人学术上有争论,有耿定理从中调和。耿定理早逝,李贽恸哭,以为失却良师益友,二人的分歧日益明朗化,以致公然论战,反目成敌。耿定向与李贽论战主要焦点为“不容己”。耿定向构建“不容己”思想得到许多阳明学者认可赞同,希望进一步把王阳明良知学纳入到纲常名教的轨道,认为“吾孔孟之教,惟以此不容己之仁根为宗耳”。(耿定向:《耿天台先生文集》卷三)(《与焦弱侯》)即使是孔、孟圣人,在寻常日用与经世层面都是“不容己”来主导的。他认为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可以与时变迁、因时变化的,但道德却是万古不变的。这万古不变的道德乃是圣人之所垂示,并将“不容己”诠释延伸,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,“夫此人孝出悌就是穿衣吃饭的这个,穿衣吃饭的原自无声无臭,亦自不生不灭、极其玄妙者,人苦不著不察耳”。(《与周柳塘》)这一学说是将阳明“良知”学发展,希望把良知学重新引导孔孟之道上来。

李贽公然挑战“不容己”,认为不能以孔孟的是非为是否,圣人的道德说教、礼制规范已脱离社会实际,也不符合人性本质,失去生命力,不能指导社会实践,批驳耿定向是假道学、伪君子。他倡导“童心”,“夫童心者,真心也。若以童心为不可,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,绝假纯真,最初一念之本心者也。若失却童心,便失却真心;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矣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

^① 沈鈇:《李卓吾传》,载《李贽研究参考资料》(一),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,第21页。

矣。”(李贽:《焚书》卷三《童心说》)李贽认为童心中没有仁义礼制,没有固定权威和教条,失去童心就失去真心,追求个性解放,思想自由。李贽“童心”不受国家权威和官僚体系所羁绊,弃官离家不顾礼制,行走于民间而不拘俗套,展现较为开放、独立的态度。但后期日益倾向于狂禅、任性、自满。

耿定向作为在事功、学问方面卓有影响力的人,又是地方世家大族,有着自觉于地方风俗教化的责任感、使命感,担心耿氏家族子弟受李贽狂狷、弃世思想影响。“因李卓吾鼓倡狂禅,学者靡然从风,故每每以实地为主,苦口匡救。然又拖泥带水,于佛学半信不信,终无以压服卓吾。”(黄宗羲:《明儒学案》卷35《泰州学案四》)驱赶李贽出黄安,二人决裂。其实这场论战是晚明讲学兴起背景下的正常学术争鸣,在二人没有完全决裂时,关于“不容己”已经展开激烈讨论。由于争论中心地带在黄麻鄂东一带,许多鄂东人士也加入其中讨论。例如,二人共同的朋友、知己,周思久(字柳塘)是耿定向儿女亲家,与耿定力弟弟定理经常一起讨论。“卓吾寓周柳塘湖上。一日论学,柳塘谓:‘天台重名教,卓吾识真机。’楚佺诮柳塘曰:‘拆篱放犬’。”(《泰州学案四》)周思久认为二人是“名教”与“真机”的区别,耿定理说“拆篱放犬”,彻底摆脱名教和礼制束缚。万历十八年,李贽刊刻《焚书》,没有经过耿定向同意,把二人论战来往书信公诸世,更是使这场论战公开化,到了险恶崩溃的边缘。由于二人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力,有些话题又是社会比较敏感话题,激起社会强烈反应,更引起学术界、朝廷官员围观、参战以致劝解。管东溟说:“好事者……以天台师与李卓吾之对立,引以为话柄,传唤四方。”(管东溟:《惕苦斋集》卷二)引起了许多服膺定向学问或地位的人攻击,一些李贽追随者也迎合、辩论,从而鄂东学术活动显得热闹非凡,激起激烈的学术争鸣。偏僻一隅的鄂东,吸引了晚明学术界关注。

四、耿李论战的当下意义

耿定向与李贽的论辩,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,褒贬不一。有关耿定向与李贽之争,现代也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探讨^①。重新审视这场论战,抛开政治、意识形态影响,这是正常的思想交锋和碰撞,激发学术争鸣、创新,也极大推动鄂东地域文化发展。

(一) 自由的学术争鸣是学术创新的必由之路

二人之间的争论是王学在明末后期的发展,泰州学派内部的剧烈分化、分歧,演变的必然历程、脉络,是王学后期演变发展的两种路径。耿定向的“不容己”和李贽的“童心说”是阳明“良知学”朝着两种不同路径发展的表现。王阳明倡导良知学,希望唤醒每位士人的天然良知,使他们具有真诚坦荡的仁人之心,立下做圣人的远大志向,抛弃物欲追求成为圣人。但是王阳明的理想没有实现,有许多士人崇敬良知学而确实以此为目标,并且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孜孜以救世为己任,但最终大多数人抵挡不了物欲横流社会的现实冲击,良知学没有能够扭转社会风气,理想与现实差距太远。尤其是泰州学派“人人皆可为圣人”之说广为传播,不仅在士人阶层传播,而且广泛流传于乡村民间。人人心中有自己的“良知”、“圣人”,以自我为中心,是非标准无法辨别,严重威胁到作为正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。耿定向作为士大夫阶层代表,开始对讲学进行反思,由于他的身份、地位决定了他的思想发展,他力图维护礼教,开始对道德问题进行反思,注重实际,加强乡里教化,以匡扶正教为己任。而以李贽为代表要求摆脱封建纲常道德束缚,主张追求个性解放,独立思考。黄仁宇认为二人就是属于在中国传统哲学人性善恶命题的学术争辩。耿定向同样是在竭力地探求一种既有形而上的根据,又融合于日常生活的真理^②。只不过李贽追求独立思考,个性解放,走向传统儒家思想的对立面并走得更远、更加超前,不能见容于世而被冠以“异端”。

二人最终握手言和颇值得玩味。之所以言和,思想观点又能相融,一方面说明,他们的思想渊源是一致的,殊途同归而已。二人从学术背景上看同属于心学,心学是一种思辨性的学问,思想的交流、融汇,观点的碰撞、激荡,才会推动学术的进一步发展,使真理进一步显现,同时也使思想家的理解与领悟

①如罗福惠的《两舍则两从,两守则两病——耿定向与李贽“论道相左”新解》,见《江汉论坛》2002年第10期;周素丽的《李贽与耿定向学术人格的对比——耿李论战的原因分析》,见《中国哲学史》2012年第3期。

②黄仁宇:《万历十五年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,第219~222页。

更加深刻。李贽持续与耿定向进行争辩,通过书信等进行讨论,争论中产生思想的火花,激发灵感,喷出思想的火焰,李贽的几个重要思想概念,尤其是“童心”说,正是和耿定向论辩的过程中提炼出来。李贽雄辩能力也在这场争论中得到发挥极致,他越战越勇,更加激发了自己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信念。另一方面,对话交流中,两人的想法如波浪一波一波逐层递进相依相承。耿定向所持的“不容己”宗旨虽是李贽批评的主要观点,但也经此一番切磋争论,给了耿定向更深入地阐述其宗旨的机会。换句话说,若没有李贽横亘于耿定向的求道路上,则耿氏今日留下的关于“不容己”的论述恐怕便不会这么多。李贽也认为与耿定向的辩论,更加促成和坚定了他追求个人自由的信念。多年之后,他仍把这次辩论视为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^①。论战之前,李贽学问、事功、名声远远比不上耿定向,论战之后,李贽声名远扬,学术著作广为流传,这场论战成就了李贽学术上的辉煌,后期主要学术著作是在此间完成的,确立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。

(二) 良好的学术氛围是鄂东学术繁荣的必要保障

以耿定向、李贽为首的学术领袖在鄂东倡导讲学并激烈论战,通过交友、交游,号召、凝聚鄂东士人和境外学术大师论道问学,推动地域学术理论水平发展,鄂东已成为晚明阳明学地域性学术活动的一部分。讲学面向社会民众开放,没有固定形式,深入乡村基层社会,社会风俗渐变,传播文化,崇道向学,鄂东有“邹鲁遗风”。推动地方教育发展,弦歌不绝,薪火相传,人文蔚起,以致明末清初,鄂东出现人才迸发盛况,鄂东文化圈雏形渐出。二人因“不同乃所以讲学”,展开一场学术论辩,从学术自由、学术发展看,得益于鄂东良好的学术氛围,也是晚明思想多样性的一个例证,更是学术繁荣的表现。论战是正常思想的交锋和碰撞,学术的争鸣,一定程度上可见鄂东是晚明思想活跃、富有创新和争鸣的地域,偏僻一隅的鄂东成为王学研讨中心,俨然成为晚明学术新据点。成为继京城、南京之后又一个讲学胜地,学术论坛的新学术据点,并与江南、江西讲学相呼应。

鄂东讲学论战,追求真知、自由辩论、勇于创新之精神,对当今学术研究以及地域文化发展有积极的借鉴作用。耿李交恶后,鄂东士人并没有因李贽得罪地方权贵大族而抛弃他,仍有许多人追随其左右,并给予经济、物质上大力资助,因此李贽得以留驻鄂东,并生活了十多年,可见鄂东士林敢于追求真知、不畏权贵、勇于斗争的风尚。李贽后期主要著作之所以能在鄂东完成,学术思想创新之所以能达到顶峰,一方面有不同声音与他辩论,激发了他的学术灵感;另一方面有许多赞成声音给予鼓励,使其越战越勇。正是有这些志同道合朋友与李贽进行学术探讨,自由发表学术见解,无拘无束地进行独立学术思维,李贽才能突破原有思想框架和思想束缚,甚至突破主流权威,有了学术创造,有不少独特见解。这种自由讲学的风气,敢于怀疑、独立思考之精神在鄂东留存延续,尤其李贽敢于怀疑,勇于批判,独立创造,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怀疑精神和大胆的批判精神,在鄂东地区影响深远,在之后许多思想家如熊十力、徐复观、殷海光、闻一多、董必武、胡风等身上都鲜明地表现出来。

● 作者简介:蔡志荣,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,历史学博士;湖北 武汉 430205。

● 基金项目: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[2010]367);湖北省重点学科教育学项目;2014 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(14Y070)

● 责任编辑:桂 莉

^①黄仁宇:《万历十五年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,第 218 页。